

前　　言

我离休以后，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古代兵书，引起了极大的兴趣。解甲不离军，闲居读兵书，颇觉其味无穷，其乐无穷。

去年以来，研读《淮南子·兵略训》，作了一些笔记，写了一些心得，逐渐加以整理，就形成了这本小册子。我深知自己底子不厚，起步又晚，不免诸多错漏，见笑于方家。但我想，能为古兵书的通俗化，尽点绵薄之力，对于普及全民国防教育，也是一件有益的事吧！所以，也就希望这本小册子能有机会和大家见面。如能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，我将感到格外高兴，因为那正是我的愿望。

作　者

目 录

《兵略训》浅析	(1)
《兵略训》译注.....	(17)
从古代军事理论上看《淮南子译注》中《兵略训》	
译文的不足	(84)
文字正误表——对《中国兵书集成》第二册中	
《兵略训》版本的错字校正	(96)

《兵略训》浅析

(一)

《淮南子》^①是西汉淮南王刘安^②组织“门客”编写的一部书。这部巨著，以道家思想为基调，并广泛吸收其他各学派的观点，构成自己的理论框架，内容博大精深，包罗万象，是中华古代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，历来受到思想学术界的重视。

现存的《淮南子》二十一篇，其中的《兵略训》，是论述军事思想的专章。《兵略训》的内容，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诸子的军事思想，例如：关于“庙算”思想，来源于孙武^③，关于“以异为奇”的思想，来源于孙膑^④；关于“义兵”思想，来源于《吕氏春秋》^⑤，关于民本主义思想，来源于孟轲^⑥；关于“兵之胜败，本在于政”的思想，来源于《文子》^⑦；关于以柔克刚，后发制人的思想，来源于《老子》^⑧；关于“王道”与“霸道”并论的思想，来源于《荀子》^⑨，如此等等，不再列举（顺便说明一下，上面列举的几种思想观点，也见之于先秦其他古籍，我这里只举其一，是觉得只要能说明问题就行了）。但是，《兵略训》并不是简单地罗列诸家论述，而是把它们揉合在一起，有所归纳，有所阐发，成为一篇包括多方面内容，而且具有自己特点的军事理论著作。因此，在研究古代军事理论的工作中，对《兵略训》给以足够的重视，自

是理所当然的了。

注 释

- ①《淮南子》，亦称《淮南鸿烈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内二十一篇，外三十三篇，内篇论道，外篇杂说。现传世只有内二十一篇。
②刘安（前179——前122），西汉思想家、文学家，刘邦的孙子，袭父封为淮南王。后因涉嫌谋反，畏罪自杀。
③见《孙子·计篇》
④见《孙膑兵法·奇正篇》
⑤见《吕氏春秋》中的《荡兵》、《振乱》、《怀宠》等篇。
⑥见《孟子》中关于民贵君轻的论述。
⑦见《文子·上义》。关于《文子》一书的真伪，学术界意见不一，一般认为是先秦古籍，也有人认为是汉以后之作，迄无定论。我是把它作为先秦古籍引用的。
⑧见《老子》七十八、六十九等章。
⑨见《荀子》中《王制》、《王霸》等篇。

（二）

《兵略训》所阐述的军事思想，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第一、关于战争的起源

《兵略训》说：“兵之所由来者远矣”，战争有着久远的历史。那么，战争的起源是什么呢？《兵略训》对此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观点：“人有衣食之情，而物弗能足也，故群居杂处，分不均求不赡则争……”。能够从物质利益的冲突中去寻找关于战争的起源，这在古代是十分可贵的。我们知道，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，阶级、国家、宗教、民族或部族之间的冲突，尽管有着各种各样的直接起因，但归根到底，不过是物质利益的冲突在不同领域中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表现而已。当然，上述各种冲突在开始的时候，只是矛盾的对立，并不等于战争，只有当上述那些冲突发展到外部对抗时，才会爆发为战争。刘安那个时代，人们还不可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。在古代兵书中，虽然也有关于战争起

因的论述，如《吴子》中讲到：“凡兵之所起者有五：一曰争名，二曰争利，三曰积恶，四曰内乱，五曰因饥”^①，其中也谈到了经济原因，但那主要是对直接起因的探讨，还不是对根本原因的追寻。所以，《兵略训》关于战争起源的观点，虽然是简略的，但在古代兵书中确是一个杰出的思想。

第二、关于义兵思想

《兵略训》关于义兵思想的论述，内容丰富而且具体。所谓“义兵”，有正义战争与仁义之师两种含义。《兵略训》指出，义兵的行动目的，必须是“为天下除害而与万民共享其利”；义兵必须有严明的群众纪律，“毋伐树木，毋抉坟墓，毋爇五谷，毋焚积聚，毋捕民虏，毋收六畜”；义兵必须有正确的政策，对反对义兵行动的，要给以严厉的处罚，对支持义兵有功的要给以封赏，要“克国不及其民”，“废不义而复有德”，“尊其秀士”，“显其贤良”，“振其孤寡”、“恤其贫穷”，“出其囹圄”，等等。《兵略训》的义兵思想，是以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的。作者把“无义之君”比作癫痫、豺狼，如果不除，那就是“杀无罪之民，而养无义之君，害莫大焉；殚天下之财，而澹一人之欲，祸莫深焉”。并进一步指出，“立君”是为了“禁暴讨乱”，安定民生；如果君主“攘天下，害百姓”，“肆一人之邪，而长海内之祸”，那是违背立君宗旨的，是“大伦之所不取”的。这就正面肯定了用战争手段讨伐暴君，是顺乎民心，合乎正义的。

第三、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

《兵略训》指出：“兵之胜败，本在于政”，把政治得失，看作是军队强弱的关键，战争胜负的根本，这是很高明的见解。这里所讲的“政”，有着丰富的含义。首先，它指的是，用兵要顺应“时势”，“明于禁舍开塞之道，乘时势，因民欲，而取天下”，“顺道而动，天下为响；因民而虑，天下为斗”。合乎这样的“政”，就能做到义兵所至，天下无敌。其次，它指的是要有正确的政治措施，“德义足以怀天下之民，事业足以当天下之急，选举足以得贤

士之心，谋虑是以知强弱之势，此必胜之本也”；“治国家，理境内，行仁义，布德惠，立正法，塞邪隧。群臣亲附，百姓和辑，上下一心，君臣同力。诸侯服其威，而四方怀其德。修政于庙堂之上，而折冲千里之外，拱揖指挥，而天下响应，此用兵之上也”。能实现这些政治措施，也就奠定了胜利的基础，这就是所谓“兵胜于朝廷”。^②在各种政治措施中，《兵略训》特别强调的是争取民心。“兵之所以强者，民也”。如果君主对其人民，能做到“苦者必得其乐，劳者必得其利，斩首之功必全，死事之后必赏”；“饥者能食之，劳者能息之，有功者能德之”，那么，军队就能强大，作战就能取胜。《兵略训》中关于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，是非常深刻的，可以说这是《兵略训》论兵的一大特点。

第四、关于战略战术思想

《淮南子·要略》中，有这样一段话：“明战胜攻取之数，形势之机，诈谲之变，体因循之道，操持后之论”，这段话可以看作是对《兵略训》中的战略战术思想的概括。现对《兵略训》中的战略战术思想，择其要者分述如下：

1、庙算思想。《兵略训》主张用兵要“胜定而后战，钤悬而后动”，“凡用兵者，必先自庙战，主孰贤？将孰能？民孰附？国孰治？蓄积孰多？士卒孰精？甲兵孰利？器备孰便？……”这就是说，在朝廷的最高层的决策会议上，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，进行对比分析，以决定这个仗能不能打？怎样打？进而制订战略方针和作战计划，“计定谋决”，然后行动。

2、兵贵无形。《兵略训》强调指出：“兵贵谋之不测也，形之隐匿也”。因为，“智见者，人为之谋；形见者，人为之攻，众见者，人为之伏；器见者，人为之备”，一露真相，便会受制于人。为争取主动，避免被动，要求用兵要做到，“藏形于无”，“进退屈伸，不见朕整”，“运于无形，出于不意”。

3、后发制人。《兵略训》主张“后则能应先”，“无为而应变”。所谓“后”与“无为”，当然不是无所作为，坐失先机，而

是有所准备，静观敌变，相机行事。其理由是，“敌先我动，则是见其形也；彼躁我静，则是疲其力也。形见则胜可制也，力疲则威可立也”。敌人行动起来了，他的企图暴露了，我就可以“视其所为，因与之化；观其邪正，以制其命；饵之以所欲，以疲其足，彼若有间，急填其隙。极其变而束之，尽其节而扑之”。

4、因势破敌。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：一是要善于造势，利用各种条件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力，造成一种威慑敌人的态势。“水激则悍，矢激则远”。如果力量处于静态，没有发挥其功能，则巨斧不能破桐薪，弓矢不能穿薄缟；如果能够象“决积水于千仞之堤”，“转圆木于万丈之谿”那样，使力量形成一种暴发之势，就会发挥出强大的威力，使敌人难以抗拒。二是要善于乘势，利用敌人的不利处境，乘机破敌。“因其劳倦、怠乱、饥渴、冻渴，推其蹠蹠，挤其揭揭”，“以生击死，以盛乘衰，以疾掩迟，以饱制饥”。而且要不失时机，抓住不放，“见敌之虚，乘而勿假也，追而勿舍也，迫而勿去也”。

5、示形误敌。把自己的真相隐蔽起来，故意示敌以假象，诱使敌人上当。如：“示之以柔，而迎之以刚；示之以弱，而乘之以强；为之以歛，而应之以张；将欲西，而示之以东”；以及“始如狐狸，彼故轻来；合如兕虎，敌故奔走”，等等，说的都是这种战法。

6、以异为奇。《兵略训》举“陶人”能把粘土制成盆盎、“工女”能把蚕丝织成文锦等事例，说明“同莫足以相治也，故以异为奇”的道理。粘土不能治粘土，蚕丝不能治蚕丝，必须是用异类事物才能治服。但这种异类事物，必须是对特定对象有克制作用的那种异类事物，如“陶人”能克制粘土，“工女”能克制蚕丝，鹞鹰能克制鸟雀，等等。将此理运用于战争中，那就是“静为躁奇，治为乱奇，饱为饥奇，佚为劳奇”，奇正相应，变化无穷。善用此法，“以万物之胜胜万物”，^⑧就能做到“其胜不屈”。

7、兵贵神速。《兵略训》强调“应敌必敏，发动必亟”，要求

行动要快，反对行动迟缓。而且不是一般的快，而是“卒如雷霆，疾如风雨”那样的“闪电式”的攻击，迫使敌人“疾雷不及塞耳，疾霆不暇掩目”，“昧不给抚，呼不给吸”，“人不及步销，车不及转轂”，陷于完全被动状态。

8、集中兵力。《兵略训》用通俗浅显的道理，来说明集中兵力的好处：“五指之更弹，不若卷手之一挫；万人之更进，不如百人之俱至也”。但是，我要集中兵力，敌方也要集中兵力，这就要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，如果敌人兵力分散，则相对来讲，我的兵力就集中了。所以说：“能分人之兵，疑人之心，则锱铢有余；不能分人之兵，疑人之心，则数倍不足”。

第五，关于将帅修养

《兵略训》把将帅应有的修养，概括为“三隧”、“四义”、“五行”、“十守”。

所谓“三隧”，就是“上知天道，下习地形，中察人情”。在另一处讲的是：“上将之用兵也，上得天道，下得地利，中得人心……”，提法微有差异，但内容是一致的，都是要求将帅要有渊博的学识。

所谓“四义”，就是“便国不负兵，为主不顾身，见难不畏死，决疑不避罪”。这是要求将帅要有公而忘私的优秀品德。在另一处又讲到“进不求名，退不避罪，唯民是保，利合于主”，说的也是这种精神。

所谓“五行”，就是“柔而不可卷也，刚而不可折也，仁而不可犯也，信而不可欺也，勇而不可陵也”，这是要求将帅要能做到，刚柔相济，智勇兼备，宽严适度，不可偏颇。性格上的偏颇，对用兵危害很大，《兵略训》在另一处讲了这个道理：“勇者可诱也，仁者可夺也，信者易欺也，廉者易谋也。将众者有一见焉，则为人禽矣”。

所谓“十守”，就是“神清而不可浊也，谋远而不可暮也，操固而不可迁也，知明而不可蔽也，不贪于货，不淫于物，不噬于

辩，不推于方，不可喜也，不可怒也”。这讲的是头脑清醒，操守坚定，廉正务实，沉着冷静等良好性格和品质。

除了“三隧”、“四义”、“五行”“十守”之外，《兵略训》还讲到，为将必须具有“不原之智，不道之道”，“独见独知”，在用兵上有独特的胆略和见识，不落俗套；为将必须多谋善断，如果“博闻而自乱，多知而自疑，居则恐惧，发则犹豫”，那么，用兵打仗，必定失败。这些也都是将帅修养的非常重要的内容。

第六、关于军队建设。

《兵略训》关于军队建设的论述，大致讲到下面几个问题：首先是调整好内部关系，增强上下之间的团结。“四马不调，造文不能以致远；弓矢不调，羿不能以必中；君臣乖心，则孙子不能以应敌”，必须是“将卒吏民，动静如身，乃可以应敌合战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必须爱护士兵，要求将吏与士兵“同甘苦，并饥寒”，平时对士兵要“积德”、“积爱”、“积恩”，这样，打起仗来，士兵才能勇敢作战，“视死若归”。其二，要有严格的纪律，“赏信而罚明”，“约束信，号令明”，“庆赏信而刑罚必”，令行禁止，使部队“勇者不得独进，怯者不得独退，止如丘山，发如风雨”，形成强大的战斗力。其三，“五官”要有明确的职责分工，而且要选用合适的人才，使“官胜其人，人能其事”，成为将帅的得力助手。其四，要“善修行阵”，抓紧部队的训练，使之做到“前后正齐，四方如绳，出入解续，不相越凌，翼轻边利，或前或后，离合散聚，不失行伍”，“阵卒正，前行选，进退俱，什伍搏，前后不相撝，左右不相干”，这样训练有素的军队，打起仗来，才能“受刃者少，伤敌者众”。其五，要有优良的武器装备，充足的给养，“甲坚兵利，车固马良，蓄积给足，士卒殷夥，此军之大资也”。其六，部队要有旺盛的士气。“将充勇而轻敌，卒果敢而乐战，三军之众，百万之师，志厉青云，气如飘风，声如雷霆，诚积逾而威加于敌，此谓气势”。这里所讲的“气势”，就是指旺盛的士气所形成的威慑敌人的精神力量。而且强调指出，“胜在得威，败在失气”，这

种士气，即精神力量，是“兵之贵者也”。

注释

①见《吴子·图国》。 ②见《尉缭子·兵谈》。 ③见《孙膑兵法·奇正》。

(三)

《兵略训》继承了《易经》和《老子》的辩证法思想，能够从事物的互相联系和发展变化中去观察判断问题，从而使它对军事问题的阐述，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度。

《兵略训》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，主要体现在以下一些问题上：

第一、能从物质利益的冲突中去寻找战争的起源。这个杰出的思想，我在前面已经论及，这里不再详述了。

第二、能对战争性质作具体分析，把战争区分为义战与不义之战。“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，将以存亡继绝，平天下之乱，而除万民之害也”，这种战争是义战，《兵略训》歌颂的就是这种战争。“晚世之兵，君虽无道，莫不设渠堑傅堞而守；攻者，非以禁暴除害也，欲以侵地广壤也”，这种战争就是不义之战，《兵略训》反对的就是这种战争。有所分析，区别对待，避免了片面性。

第三、能深刻阐述军事与政治的关系。《兵略训》明确指出：“兵之胜败，本在于政”，“地广人众，不足以强；坚甲利兵，不足以胜；高城深池，不足以固；严令繁刑，不足以威。为存政者，虽小必存；为亡政者，虽大必亡”。并举楚国和秦王朝的失败为例。这种论述，已能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。《兵略训》不但能深刻阐明政治是军事的基础，且能认识到军事是维持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。“教之以道、导之以德而不听，则临之以威武；临之以威武而不从，则制之以兵革”。“合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；威仪并行，是谓至强”。恩威并用，文武兼施，讲的是

“两手”。这已明确提到军事在国家政权中的重要作用了。《兵略训》所论述的军事与政治的关系，与《尉缭子》所讲的“兵者，以武为植，以文为种，武为表，文为里”，正是一脉相承的思想。^①

第四、在肯定“甲兵”、“车马”、“器备”、“蓄积”等物质条件的重要作用的同时，更加重视精神的作用。《兵略训》中讲“兵有三势”，首先讲的是“气势”；在讲到“善修行阵”、“善为天道”、“善为诈佯”、“善为充干”、“善用轻出奇”、“善为地形”、“善因时应变”、“善为设施”等问题时，说：“凡此八者，不可一无也。然而非兵之贵者也”，“虚实之气，兵之贵者也”。这里所讲的“气势”、“虚实之气”，实质上都是在强调精神的能动作用。

第五、在重视将帅作用的同时，对士兵的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。“将无疑谋，卒无二心”，“将以民为体，而民以将为心”，都讲了两个方面。对于将帅来讲，士兵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，“良将之卒，若虎之牙，若兕之角，若鸟之羽，若蛇之足……”。

第六、“以异为奇”的战法，体现了事物之间的制约关系。若战胜敌人，必须找到能对敌人起克制作用的异类事物（包括人的素质、武器装备、战略战术等方面）。这种观点来源于五行相生相克的学说，《兵略训》运用来说明克敌致胜之理，是符合辩证法关于事物的互相关联和互相制约的原理的。

第七、能认识到在兵力运用上多与少的辩证关系。“能分人之兵，疑人之心，则锱铢有余；不能分人之兵，疑人之心，则数倍不足”，“彼有所积，必有所亏”。这和孙武讲的“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，则无所不寡。寡者，备人者也；众者，使人备己者也”，基本精神是一致的。^②

第八、在讲到将帅品德修养时，强调了适度的原则。“仁、勇、信、廉”，是“人之美才”。但“勇者可诱也，仁者可夺也，信者可欺也，廉者易谋也”，如果有所偏颇，则优点也可能授人以柄，为人所乘。因此，用兵不可过分依赖个人的品格，“兵以道理制胜，而不以人才之贤”。作为优秀的将帅，必须做到“柔而不可卷也，

刚而不可折也，仁而不可犯也，信而不可欺也，勇而不可陵也”。在这些论述中，已经包含了关于事物的“度”的观念，如果没有掌握适度的原则，则过犹不及，事物就向其反面转化。

第九、兵法的变化和战略战术的灵活性。用兵的方法，并没有固定的模式，“仪表者，因时而变化者也”，要“因形而与之化，随时而与之移”。所以，“良将”用兵，常有“不原之智，不道之道”，就是说，不因袭老一套的打法，而能独出心裁，出奇致胜。《兵略训》还讲到“所用不复，故其胜可全”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。孙武也早就讲过“战胜不复，而应形于无穷”^②。如果重复某一种打法，被敌人摸清了，自己是要吃亏的。《兵略训》中的辩证法思想，还可以举出一些，这里就不再多讲了。

当然，《兵略训》中的辩证法思想，是朴素的辩证法，它还不能完整地科学地解释军事领域中的诸种复杂现象及其本质，揭示军事运动的基本规律，象今天以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军事辩证法科学那样。当然，我们不能苛求于前人。

注 释

①见《尉缭子·兵令上》

②③见《孙子·虚实》

(四)

上面所谈，是对《兵略训》内容的积极方面，作个简要介绍。现对《兵略训》的不足之处，就个人所见，试作一点具体分析。

第一、对“存亡继绝”的肯定，是不正确的。《兵略训》一开始就说，“古之用兵”是为了“存亡继绝”，接着又说：“霸王之兵”，“非以亡存也，将以存亡也”。这种把“存亡继绝”作为“义兵”的行动目的的论述，是不正确的。“存亡继绝”这个口号，是春秋时期提出来的，名义上是制止兼并，保存那些濒临灭绝的封建王国，维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；实质上不过是强国争夺霸权的一种漂亮的借口而已。

历史事实告诉我们，春秋战国时期，是奴隶制走向崩溃、封建制走向胜利的新旧交替时期，新兴的封建势力，用战争手段为自己开辟道路。正如孙膑所说：“战胜而强立”，^①仗打胜了，就强大起来了；仗打败了，就难免被“吃”掉。周初号称八百诸侯，到了战国时期，只有所谓“七雄”——七个大国，加上处于“附庸”地位的若干小国而已，哪里有什么“存亡继绝”？固然，兼并就其具体争端来讲，有是有非，连年战祸也给人民带来了痛苦；但就总的发展趋势来讲，大并小，强吞弱，最后由秦统一，反映了封建势力的发展，历史的进步。

“存亡继绝”这个口号，在春秋战国时期行不通，到了汉初就更加不合时宜了。汉初的制度，是郡国并立，一方面，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，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，另一方面，又分封了许多诸侯国。这些诸侯国，各自为政，形成割据，甚至拥兵叛乱，对中央政权危害甚大。汉初的几个皇帝和一些谋臣，都看出了这个问题，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性的措施，但由于新朝初立，百废待兴，对这个问题一直未能从根本上加以解决。直到汉武帝时，才采取了果断的措施，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（虽然还有些王爷存在，但只是享受高官厚禄，没有政治实权了），汉王朝也才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发展。在这种历史背景下，《兵略训》重弹“存亡继绝”的“老调”，虽然讲的是“古之用兵”，但客观上是在维护汉初分封诸侯国，和中央唱反调。刘安的倒霉，大概不能说与此无关吧？

第二、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认识不足，把义战理想化。《兵略训》讲：“义兵之至也，至于不战而止”。道义的力量，是义兵胜利的政治基础，这是毫无疑义的，但义兵的取胜，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。反动势力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，“不战而止”的情况，只有在力量对比悬殊，或胜负大局已定的时候，才会出现。汤伐夏，周伐殷，刘邦兴汉，都可以说是义兵吧？但无论哪一个都不是“不战而止”，而是经过多次较量，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。

《兵略训》又说：“得道之兵，车不发轫，骑不被鞍，鼓不振尘，旗不解卷，甲不离矢，刀不尝血，朝不易位，贾不去肆，农不离野……”，“民不疾疫，将不夭死，五谷丰昌，风雨时节，战胜于外，福生于内，是故名必成而无余害矣”。兵马一到，天下太平，多么美妙啊！可惜的是，战争不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就是义战，也不会有这种情况，这只是一种空想，一种美化。《老子》：“师之所处，荆杞生焉；大军之后，必有凶年”。^②孙武也看到了战争对国计民生的影响：“中原内虚于家，百姓之费，十去其七，公家之费……十去其六”，^③因此，他说：“不尽知用兵之害者，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”。^④他们的话，都很中肯而且符合实际，说明他们对战争的特点以及战争与经济的关系，有着深刻的认识。

战争是交战双方，互施暴力手段，以力图制服对方的生死搏斗，它必然会打乱正常的社会秩序，影响经济活动的进行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，等等，这都是客观事实。就说正义战争吧，那是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，因而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，但由于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用于战争，人民由此遇到某些困难，虽然是暂时的，却是在所难免的。认识到这一点，正确处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，在战争中，尽可能抓紧经济工作，以支持战争的进行；尽量精打细算，节省民力；还要考虑到战后的经济恢复与建设；并把这些都列入战略规划范围之内这才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作法。如果陷于空想，把义战理想化，只见其利，不见其害，只见军事，不见经济，那是很大的片面性和盲目性，其后果将是很不利的。

第三、否认“以少胜众”，是不符合战争实际的。《兵略训》中讲：“今人之与人，非有水火之胜也，而欲以少耦众，不能成其功亦明矣。兵家或言曰：少可以耦众。此言所将，非言所战也。或将众而用寡者，势不齐也；或将寡而用众者，用力谐也。若乃人尽其才，悉用其力，以少胜众者，自古及今，未尝闻也”。这段话讲的与事理不合，而且太绝对化了。交战双方的兵力，不但会有量

的差别，而且也会有质的差别。“人尽其才”，而才有高低：“悉用其力”，而力有大小。都发挥了自己的最好水平，其结果并不会完全一样的。在军事对抗中，“以少胜众”，有多种情况，例如：

- 训练有素的精兵，对付乌合之众；
- 武器装备精良齐全的军队，对付武器装备落后残缺的军队；
- 占据良好地形的军队，对付处于“死地”之敌；
- 养精蓄锐、吃饱睡好的军队，对付疲惫饥饿之敌；
- 士气高涨的胜兵，对付丧失斗志的败兵；
- 用轻骑去突袭戒备松懈之敌；
- 体力剽悍的壮汉，对付体小力弱之敌；
- 一方能作到科学的组合，合理的分工，使综合力量大于个体力量的简单相加；另一方则作不到这一点；
- 一方有优秀的将领，良好的组织指挥，另一方将帅无能，组织杂乱无章，指挥失误；
- 一方万众一心，同仇敌忾，另一方内部不和，勾心斗角；
- 一方守卫本土，以逸待劳，另一方劳师远征，水土不服；等等，举不胜举。

凡此诸种情况，都会出现“以少胜众”的可能性。

还有一种“以少胜众”的情况，也需要说一说。这就是在战略上以少胜多，而在战役或战斗上以多胜少。在战争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战例：在战略上居于少数或劣势的一方，由于具备若干基本的有利条件，再加上运用巧妙的打法，造成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或多数，因而取得局部胜利。如果坚持得法，经过多次战斗，积小胜为大胜，最后在全局上造成敌我优劣地位的转化，则最后的胜利就属于战争开始时处于劣势或少数的一方了。

第四、接受了兵阴阳家的某些迷信思想。《兵略训》把古代军队指挥用的旗帜“左青龙、右白虎、前朱雀、后玄武”，作为“天数”与“地利”、“人事”并列为用兵的“仪表”；把“明於星辰日

月之运，刑德奇谿之数”，视为“战之助”；把“明於奇谿、阴阳、刑德、五行、望气、候星、龟策、机祥”，作为用兵的八个重要问题之一。这些论述，反映了兵阴阳家关于天象变化预示人间祸福、用兵吉凶的神秘观念和迷信思想。这种神秘观念和迷信思想，古代杰出的军事家都是不赞成的。例如，孙武说：“天者，阴阳、寒暑、时制也”；^①尉缭说：“刑以伐之，德以守之，非所谓天官、时日、阴阳、向背也”。^②《兵略训》在这点上，显然退了一步。当然，我们也应公正地指出，《兵略训》的主要倾向是强调“人事”，而不在“天数”，例如讲武王伐纣，遇到各种凶兆，但由于是仁义之师，终于取得了胜利，就足以说明这一点。

第五、动则受制的观点，反映了道家思想的消极方面。《兵略训》说：“虎豹不动，不入陷阱；麋鹿不动，不罹置罘；飞鸟不动，不结罔罗；鱼鳖不动，不擐唇喙。物未有不以动而制者也。”静能胜动，柔能克刚，这是老子讲的辩证法，但他讲的也不完全。静能胜动，动亦能胜静；柔能克刚，刚亦能克柔，关键是看条件。在这点上，《易经》讲的比较全面，老子则偏重静和柔，这正是道家思想的消极方面。

动就一定受制吗？不一定；静就一定不受制吗？也不一定。虎豹等动物，或主动求食，或被动避敌，都是动，动就能生存下去，不动则不是饿死就是被吃掉。

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。如果能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，则无论动与静，均有行动的自由；反之，无论动或静，均将寸步难行。打仗，有时静以待敌，有时动以应敌；有时后发制人，有时先发制人，都是兵法应有之义，不可偏执一端。《三略》上有一段话讲得很好：“柔有所设，刚有所施，弱有所用，强有所加，兼此四者而制其宜”^③这段话里面虽然没有讲动与静，但其理相通，它告诉我们，用兵之道应该是，动静相兼“而制其宜”。

注 释

①见《孙膑兵法·见威王》 ②见《老子》三十章 ③、

④见《孙子·作战》 ⑤见《吴子·治兵》 ⑥见《孙子·计篇》
⑦见《尉缭子·天官》 ⑧见《三略·上略》

(五)

《兵略训》是在两千多年前写的，古人智慧的结晶，虽经时光的流逝，仍不减其光辉，它那丰富而深刻的哲理，今天读来，仍然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。

“兵之胜败，本在于政”，是战争根本经验的概括。这个正确的论断，运用来观察古代战争是适用的，运用来观察今天的现实，也是适用的。如果政治没有搞好，倒行逆施，国家乱糟糟的，就是有先进的武器，庞大的军队，也还是脆弱的，既经不起内忧，也经不起外患，古代的楚国就是这样。现在，不是也有超级大国不战自溃这样的活生生的例子摆在我面前吗？

“兵之所以强者民也”，这真是千古名言。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强大，正因为他是人民的军队。我们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、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和最新式的武器装备，但归根到底，我们依靠的是人民，我们打的还是人民战争。当然，不是陈胜起义举着木棒、扁担那样的人民战争，也不是小米加步枪那样的人民战争，而是现代化的人民战争。核武器出现以后，有些人鼓吹“武器决定论”，似乎有几颗原子弹、氢弹，就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了，就可以使资本主义永世长存了。对于反动分子来说，这是妄想症，对于有这种认识的善良的人们来说，这是幼稚病。不错，核武器破坏性很大，很厉害。但是，帝国主义能够拥有它，我们也能够拥有它，给他来个“以毒攻毒”，何必害怕？从长远的观点来看，帝国主义和它的核武器，都是纸老虎。^①人民能够战胜巨大的自然灾害，也就能够战胜任何新式武器所造成的大灾害。人们能够制造出一种武器，终久还会有人制造出能够克制它的另一种武器。“最后的武器”之类的说法，只是“神话”，不是辩证法。